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转型:历史与未来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刘宇

2012年8月28~29日,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2012年年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会议由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27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中既有老一辈专家,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格日勒图到会致贺词,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会长、苏州科技大学的姚海教授致开幕辞。围绕年会主题“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转型:历史与未来”,与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探讨。

一 关于苏联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苏联解体,俄罗斯的转型,使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也随之发生变化。档案材料大量公布,这对苏联史研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今后应如何发展,成了很多学者热议的话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认为,文革前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虽然情况有所变化,对苏联历史的各种问题进行重新解释,思维上有突破,但没有摆脱过去的框架。如今大量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为以求实存真的科学精神研究苏联历史提供了可能。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从细节入手,进行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对以前没有确凿证据证实的东西要提出质疑。要建立新的苏联史解释体系,不要带功利性、目的性去解释苏联。对苏联史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策层面,更要从制度运行层面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否则很难对体制做出科学的解释。

华东师大的余伟民教授认为,今后苏联史的研究应在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史料上的突破。近几年随着大量档案文献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重建了苏联历史的史实。这些史实已经否定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旧解释系统。二要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重建新的解释系统。这个突破则比较困难。他认为对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能以简单化的宿命论的思路进行解释。

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有很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必须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分析,比如苏联解体就是历史的客观逻辑与个人行为相结合的结果。

苏州科技大学的姚海教授谈了俄国革命史的研究状况及方法论问题。他指出我国学术界对“二月革命”以及二月到十月之间的革命进程关注不够。目前的选题都侧重于理论性的、原则性的问题,如革命的前提、性质、必然性、意义,或者是政策的正确性。而最需要做的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探索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第一任务,只有首先弄清历史是什么样才可能探讨为什么是这样,对以后有什么影响。避免从理论到理论,努力做到论从史出。进行实证研究还要采用一些新方法,如现代化的理论、社会学的方法、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等。他强调应该对俄国革命的根源和条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解释方式上打破长期形成的概念化、程式化风格,要把俄国的革命放在18世纪以来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历史坐标系里面来讨论。只有在这个坐标系内,我们才能对俄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有哪些矛盾,哪些特点,对革命的发生、条件、根源有一个尽可能客观的认识和理解。中国政法大学的金雁教授指出,以前的苏联史研究中自由派领袖、社会革命党领袖,包括白俄将军,这些革命的当事者回忆和反思缺位,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这些人作品的挖掘,使苏联史研究更加丰富。

对实证研究是不是需要价值判断的问题,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建华教授认为,历史研究不应当有主观的东西。而社科院俄欧亚所的张盛发研究员则认为实证研究是需要的,但仅仅有实证研究还不够,还需要价值判断,需要世界观。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朱剑利认为,对苏联史的解释不能太意识形态化,苏联的历史才70年,而俄国的历史上千年,苏联实际上是俄国上千年历史发展逻辑的结果。应当把苏联历史和俄国历史打通了进行解释。学者们对使用档案进行苏联史研究没

有异议,但强调使用档案一定要辨别真伪。

二 对俄国^①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各种材料的大量公布及新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使我国对俄国历史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与会者对俄国历史上的诸多重大问题也形成了比以前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陕西师范大学的曹维安教授对7~17世纪的俄国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俄罗斯文明是不断进行选择的文明,9至17世纪形成了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历经古罗斯(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两个阶段。他认为国内史学界长期认为古罗斯是早期封建国家的说法不确切。封建制是与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而古罗斯的大土地占有制在11世纪中期的“罗斯法典”颁布后才逐渐形成,因而,不能把古罗斯理解为封建国家,古罗斯实际上是一些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国家(城邦国家),是维切与王公共同治理。15、16世纪,封地制获得迅猛发展,标志着俄罗斯土地国有制(土地王有制)的建立。居统治地位的土地国有制是在罗斯各地经济上缺乏紧密联系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的主要因素,对罗斯国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大公的“世袭领地”变成“国家”的过程。

帝俄时期的律师制度是国内史学界以往较少关注的问题,陕西师大的郭响宏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在《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中指出,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引入了律师制度,律师辩护因而成为帝俄晚期司法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律师制度建立之初因其严格的职业准入和有效的监管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律师走上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职业发展道路。但其独立发展和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日渐为沙皇专制政府所不容,沙皇政府停止审批新律师协会的成立申请和私人律师制度的引入大大影响了律师制度的发展。但律师制度的创立和实践对帝俄晚期的社会变革和法制国家建设有积极意义。

斯托雷平改革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杜立克教授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斯托雷平改革》一文中将斯托雷平的改革放在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他所实行的农业改革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土地“整理”,而且比之前历次改革都深刻得多,是俄国进行现代化的一次重大尝试。改革带动了俄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但最终随着斯托雷平的遇刺而失败。这一结果标志着俄国的社会进化改革的结束,并将俄国引入革命与动荡时期,对沙皇政权的覆灭起到了助推作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吴贺在《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与

国家理念》一文中则侧重于对斯托雷平改革思想的梳理和国家理念的挖掘。她认为,斯托雷平承袭彼得大帝所建立的“国家”理念,以“共同幸福”为根本法则,倡导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力、强制力,强调小团体权利要服从俄罗斯的整体权利。这一理念催生了“走俄罗斯民族自己的道路”、“我们需要伟大的俄罗斯”、渐进式发展道路、强有力的政府等一系列理念,不仅对斯托雷平的改革实践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仍深刻影响着今日的俄罗斯。

俄国知识分子问题是近些年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中国政法大学的金雁教授在《文化史上的多面“狐狸”: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对19世纪40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共有特点进行了概括:第一,俄国存在明显的“文学中心主义”;第二,贵族的政治行动能力很弱;第三,贵族的忏悔情结严重;第四,贵族怀有反资本主义情结,对西方普遍失望;第五,贵族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宗教敏感。

革命史研究是俄国史学界的传统问题,本次年会上一些学者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苏州科技大学的谢国良在《俄国三次革命中的精神考验》中摒弃了从政治层面研究俄国革命的传统角度,选取了文化与精神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他认为,俄国革命是俄国精神历史发展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继而社会矛盾全面爆发,拉开了三次革命的序幕。这三次革命在精神层面起初由自由主义引导,随后是民粹主义引导,最终布尔什维克树立起恢复道义的大旗,获取了民心,取得了政权。综合而言,20世纪初的俄国通过三次革命实现了精神的救赎。姚海教授谈到了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他认为解密档案部分证明了德国经费问题的存在,继续对这个问题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认为布尔什维克被德国收买、充当德国利益代理人的说法,也没有依据。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接受和利用德国金钱只是一个策略问题。它为夺取政权而采取的使本国政府战败、主张立即退出战争的立场,客观上与德国的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近期目标的接近,是战争与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相互关系的基础。

吉林大学的李春隆教授谈了列宁对社会主义“官”制的探索。他认为列宁对社会主义官制的探索经历了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初期,他按照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原则进行了官制的试验,限于残酷的现实环境和俄罗斯固有的文化传统,不得不转而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列宁缔造的这套政治体制在战时和建设时期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未能防止官僚化问题的产生。在列宁生命的晚

^① 这里所说的俄国不是我国学术界传统上所指的1917年以前的俄国,而包括苏联时期。实际上当今的俄罗斯联邦翻译成俄国更好,苏联历史只是俄国历史的一个时期。

期,他试图通过改革克服这一体制的官僚主义弊端,但问题的症结恰恰存在于他所创建的高度集权制中。这一点,列宁终未能有清晰认识,致使他反官僚主义的努力无果而终。

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马龙闪研究员分析了苏联30年代大批判对联共(布)党史文化形成的影响。他指出,3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批判,特别是哲学批判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出版,对教条主义、左倾激进主义和空想主义起到了传播作用,使联共(布)的党史文化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并渗透到苏联国内各条战线,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文化艺术各部门,甚至是自然科学技术领域。不仅如此,它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苏联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次年会有多位学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中央编译局的徐元官在题为《战后苏联反犹太人运动述论》的发言中指出,二战后苏联掀起反犹太人运动,根本原因是战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与苏联日益恶化的关系促使苏联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新的冷战环境。在战争中与西方国家保持亲密关系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指泄露了斯大林的家庭隐私,成为斯大林策划发动反犹太人运动的导火索。若往前追溯,早在二战期间,苏联国内犹太人筹划在克里米亚建国的活动就令斯大林极为不满。斯大林甚至产生犹太人有与美英等国合谋瓜分苏联领土的想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斯大林最终开启了反犹太人运动。陕西师大的宋永成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为中心也谈了战后苏联的反犹问题。他认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与当时苏联国内的诸多反犹案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分析档案文件,发现在美苏冷战达到第一次高潮之际,苏联当局精心策划了犹委会案,其目的不仅是要消灭苏联社会的犹太精英,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被视为第五纵队的整个苏联犹太民族。这一案件充分暴露了反犹主义传统在苏联社会的流毒之深,成为苏联犹太人后来大量移居国外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山大学的肖瑜认为斯大林战后反犹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种族的,更不是制度性的,是纯粹出于其政策的需要。冷战全面爆发及以色列出现倒向西方的苗头是导致斯大林战后反犹的重要因素。社科院欧亚所的刘显忠通过对赫鲁晓夫时期民族关系方面“解冻”措施的梳理,发现这些措施的实施并未真正实现解决苏联民族问题的预期目的,反而增添了负效应。究其原因,是因为赫鲁晓夫把批判斯大林作为权力斗争的手段,实质上并未放弃斯大林的方式,客观上仍在维护斯大林的理论 and 体制,所以他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本质,限制了他改革的路径和手段。在“解冻”过程中,无视苏联等级制民

族国家结构的特点,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不注重协调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这些都是导致“解冻”成果寥寥的重要原因。

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张丹分析了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她以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至1928年颁布实施的住房政策为依据,考察了集中式和分散化两种住房管理体制的运行情况,指出囿于战时环境和财力因素,加上住户与住房责权关系不明,集中式住房管理政策效力极为有限。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陆续出台分散化的住房管理政策,它的运行基本克服了集中式住房管理政策的弊端,苏俄城市居民的住房总面积有了增加,住宅公用设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并有大批新式住宅建成。但从整体来看,苏俄城市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缓解。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我国学界关注不多,内蒙古师大的郭永胜对1965年至1984年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意识形态强求一致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一股潜流。这场运动的参加者成分复杂,是苏联国内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危机的反映。由于苏联党和政府压制甚至敌视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见,不能妥善解决他们的诉求,致使这场运动久拖不决,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及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苏联外交始终是研究苏联史学者关注的重要方面,沈志华教授分析了朝鲜战争起因与斯大林的决策动机。他考察了朝鲜战争前斯大林的决策过程及相关影响因素,探究了斯大林的真实战略目的。他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失去通向太平洋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战略的重大损失,其结果将导致苏联在亚洲失去战略依托。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对韩国发动进攻,既非鼓励和推动亚洲革命的举措,也非苏联外交战略转变的标志,实质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保障(或重建)苏联在远东地区传统战略的支撑点。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结局如何,都将保证斯大林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

张盛发研究员在《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若干思考》中对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外交档案的解读,他认为,赫鲁晓夫作为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关键人物,在本质上延续了斯大林的外交理念,期望推动世界革命的愿望驱使他作出支援古巴革命的决策。古巴导弹危机中交织着苏联与古巴、苏联与美国、美国与古巴等多重关系的演进,既牵连着世界局势,也受到世界革命形势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兴教授在《论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关系中的中国因素(1949~1989)》中将新中国与苏联

40余年的交往划分为结盟、对抗和缓和等3个时段,分别考察了这3个时段内中国因素对苏联与东欧关系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在苏东关系中的影响力是随着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及国际威望上升而逐步增强的,并直接取决于中苏关系的发展状况。中苏结盟时期,中国是推动苏东同盟的力量;中苏对抗时期,中国根据东欧国家的不同情况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外交往来;在中苏关系缓和过程中,东欧则发挥了中介和桥梁作用。

三 关于东欧问题的研究

东欧国家的转型是本届年会的重要议题。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马细谱研究员在《中欧之虎:波兰》中对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波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波兰之所以能成为欧盟国家中唯一一个实现GDP正增长的国家,与其国内工农业基础扎实、市场容量大、劳动力素质高、法律体系完备关系密切;此外,波兰利用“东方伙伴计划”成功建立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通过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密切了与欧盟国家的经济关系,得以吸引大批境外投资壮大本国经济。这些举措对波兰成功抵御经济危机的侵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所的刘邦义研究员则强调波兰史的研究亟待加强,尚有诸多研究空白需要填补。

谈到东欧国家转型的历史溯源,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李锐认为,东欧各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导致了它们受外部影响大,但各国的发展也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战后的人民民主政权、多党政权是妥协的结果,社会基础有多大值得研究,因为东欧在1929~1933年也形成了独裁政权。东欧全盘接受苏联模式,与苏联因素有关,但是否东欧本身也有这个要求,需要仔细研究。在研究东欧国家的转型问题时,除了分析地缘因素、外部因素,还要挖掘转型的内在逻辑。不应简单地将东欧国家转型概括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外交的西方化,更应将其看作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变过程。如果在研究中能够大量引用社会学资料,运用结构理论、制度理论、全球体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将会获得更深入的见解。

江西财经大学的杨友孙分析了欧盟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政策在东欧的实施情况,认为该措施在东欧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中东欧国家有较严重的歧视与排斥少数民族传统、投入资金有限以及欧盟促进“社会融入”政策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使中东欧国家在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社会方面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

四 对当今俄罗斯的研究

本次年会除了探讨历史问题,还涉及了当今俄罗斯的现状。华东师范大学的冯绍雷教授在《俄罗斯精英嬗变与普京新政》的发言中认为,俄国的精英阶层比西方其

他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国家走向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俄国的精英经历了多次嬗变,1990年代的精英为了改革奋不顾身,不计个人利益;进入21世纪的精英较为注重执行与协调,也更加关注个人利益;2009年后新一代的精英极具“参与感”,更加关注权力分配,相比之前的精英阶层,他们表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新状态。谈到普京的总统竞选,冯教授认为,普京的成功在于紧抓强国理念,能够动用各种资源辅助竞选,加之反对党力量较为薄弱,促成了普京能够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宪举研究员在《普京再任总统以来的几个执政特点》的发言中对2012年5月7日普京再次就任总统以来的执政情况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他认为普京一方面兑现总统竞选时的一些承诺,进行了适当的改革,包括放宽建党限制、恢复州长直选、建立公共电视台等。另一方面,普京通过建立强有力的总统班子等措施加强总统集权,将俄罗斯的权力重心从政府转到克里姆林宫,回到2008年前“大总统,小政府”的模式;在经济上,他把能源和军事工业放在发展首位,承诺利用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在社会领域,他通过修正集会法、恢复诽谤罪、监控非政府组织、实施网络黑名单法等措施强化社会管理。这一系列举措的实行反映了普京以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为主,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执政理念和方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的发展走向。

关于俄罗斯的宗教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戴桂菊教授探讨了俄罗斯政教关系的发展轨迹及演变规律,指出了俄罗斯的宗教政策具有的突出特点:(1)宗教政策始终围绕东正教而制定;(2)国家对东正教的态度经历了从扶持到限制、排斥,再到重新扶持的曲折过程,其中永恒不变的是对东正教精神内涵的利用;(3)俄罗斯国家政权对不同宗教派别长期保持“区别对待”的态度。北京大学的徐凤林教授在《东正教复活节圣火“奇迹”之争》的发言中介绍了圣火奇迹引发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和世俗社会的广泛争论,通过圣火之争,可以看出,第一,教会把圣火的本质理解为上帝恩典,而把恩典理解为对人的内在改造;第二,东正教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神秘主义成分,但并非完全肯定神秘主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叶召霞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住房公用事业改革问题。她认为,俄罗斯的住房公用事业改革虽已进行了20年,但未见显著成效。随着固定资产的不断折旧,该经济部门的境况日渐严峻,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更加低下,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严重威胁着公民利益。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1)住房公用事业基本面较差,维护成本高;(2)执政者重视不足,造成问题累积;(3)公共服务企业改制不到位,致使企业资金匮乏,债务繁重;(4)专业人才缺乏,管理秩序混乱;(5)部分居民抵

制住房公用事业改革;(6)法律不够完善,现有法律矛盾重重。

中央党校的左凤荣教授在《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兼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中针对苏联解体问题提出了与电视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不同的看法。左教授认为,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责任者——苏联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没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从斯大林时代起,苏联体制逐步僵化,问题累积,人民不满、社会不能良性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得要领,苏共的民主化进程不利,失去民众信任,最终酿成苏联解体的惨剧。而经过20余年的发展,俄罗斯基本完成了从原苏联高度集权、一党制、计划经济向分权、多党制、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正在相对平稳的轨道上发展。

五 国外的相关信息介绍

学术会议的目的除对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切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互相通报学术信息。本次年会在这个方面也有充分体现。

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黄立菲、刘凡介绍了匈牙利学者通过解读档案,对1956年事件性质、1989年剧变目标、苏联与东欧国家经济及里根星球大战计划作用等问题所提出的新观点。针对“匈牙利事件”,有匈牙利学者反对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认为没有档案资料证明这是一场反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学者从与以往全然不同视角看待这一问题,认为当前匈牙利沉重的经济形势为“匈牙利事件”的评价蒙上了功利色彩,外部因素干扰了对这一事件的客观评价。在对国家转型的认识上,匈牙利学者认为,1989年革命追求的是匈牙利民族独立、民主的目标并未实现,革命的目的愈益模糊。因此,1989年革命只是伪革命,1989年迄今的转型仍是没有完成的革命。

首都师范大学的林精华教授介绍了冷战后美国“苏联学”的研究状况,认为美国将二战时期学界与政界合作

的模式应用于冷战时代的苏联问题研究,催生了集研究、教育、政策咨询为一体的“苏联学”。这一“超级”学科脱离了学术研究的常规框架,充满了意识形态化的色彩,缺乏良性发展的研究基础,是美国政府主导下的冷战产物。随着苏联的解体,旧有的苏联学研究模式难以为继。如何摆脱冷战思维,确立新的俄罗斯研究模式成为美国斯拉夫学界面临的难题。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建华教授介绍了今年俄罗斯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情况,通报了当今俄国历史学研究状况。他指出,苏联时期的历史研究服务于政治,主要为苏共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依据,是一种政治化、讲政治的历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史学研究向专业史学转型,与政治保持某种距离,真正把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以求存真为目的。另外公共史学在当今俄罗斯兴起,非职业史学家大量出现,写出了大量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历史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很多不准确的东西。

纵观本次年会,具有三个突出特点:(1)选题全面。涵盖俄国苏联历史、俄罗斯和东欧文化、俄罗斯东欧中亚社会转型等,凸显了年会主题。另外,东欧国家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增多,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2)研究视野宽广。学者们在对传统研究方向给予持续关注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俄罗斯国家形象塑造、苏联住房管理、列宁时期的书刊及检查制度、俄罗斯肖像画研究、满语“locha”和“oros”由来等一系列新课题的提出成为此次年会的一大亮点。(3)问题研究与研究方法同步推进。学者们的发言不仅探讨了具体的问题,而且在苏联东欧史的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诸多新的思路。从此次会议的论文来看,一手档案史料在研究中已经得到普遍运用,这将极大的增强苏联东欧史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客观性、科学性,促进苏联东欧史研究形成更加健康的风气。

(责任编辑 向祖文)

